



女权主义批评的反思

[日期: 05-06-11]

来源: 文化研究网 作者: 挪威 特里尔·莫伊著 青诤译

[字体: [大](#) [中](#) [小](#)]

(上)

以前, 英美女权主义批评家对文学理论大都不感兴趣, 甚至抱敌视态度, 她们常常把文学理论视为一种绝望而又抽象的“男性活动”。然而, 这种态度目前正在开始改变, 20世纪80年代无疑标志着女权主义批评领域理论反思的突破。在这里, 我打算考察一下那些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功能和目的作出进一步女权主义反思的先驱者。基于此, 我集中选择了在我看来可以代表英美女权主义批评的三位批评家的理论著作, 这三位批评家是: 安耐特·克劳蒂妮, 伊莱思·肖沃尔特和迈娜·杰海伦。

安耐特·克劳蒂妮

安耐特·克劳蒂妮的《关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定义的几点说明》是女权主义批评家中最早打破理论沉闷局面的论文之一, 它最早刊登在1975年的《批评探究》杂志上。文章一开始就表明了她的新观点: “迄今为止, 没有任何人能够系统地阐释女权主义批评概念的确切定义”。克劳蒂妮在对各种女权主义批评定义作一番简要评述之后, 提出了主要问题: 应该把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来研究。在说明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妇女文学有点不同凡响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同时, 克劳蒂妮忧心忡忡地说, 这种观点可能会导致过早地下关于妇女自然属性的结论, 抑或围绕着“妇女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相对价值”而争论不休。克劳蒂妮认为, “女权主义批评的长久任务在于去发现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妇女文学不同于男性文学”, 她非常关心这一点。既然性别是一个相对的统一体, 那么如果不加比较地就确定出风格或内容上的差异性显然不太可能。“如果我们坚决要求寻找我们可以明确标为女性模式的某种东西, 那么我们理当找出它的对应物, 男性模式”。由此可见, 克劳蒂妮提倡女权主义比较主义批评(feminist Compar-ativism), 正象迈娜·杰海伦六年之后所做的那样。

尽管这种批评观带有某种告诫性, 但克劳蒂妮还是认为, 运用归纳法我们可以得出有关女性文学风格的一些结论, 如果我们

一开始就把每一位作者和每一位作者所写的每一单篇作品看作是独特而又不同凡响的, 尔后我们进行慢慢地探讨, 认真地阅读, 这样就会发现什么东西能反复出现,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会发现, 某种东西是否能反复出现。

然而, 这种方法有点自相矛盾, 因为即使克劳蒂妮希望我们摒弃有关妇女文学的一切先入之见, (“我们不应该……以假设[无论承认与否]来开始研究, 而应该带着问题来研究”), 但仍然很难看出, 这些多少带点无意识

的先入之见怎样才能不影响我们去读解每一位“不同凡响”的个别的作者呢？怎样才不致于影响我们对那些经过挑选和比较的特征下结论呢？克劳蒂妮亲自在妇女小说中找出好几种典型的风格模式，“自反认知”（reflexive perception）模式和“置换”（inversion）模式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种模式。当小说中的人物“突然意识到自己或自己的某个部位正在无意识地进行某种活动，或突然意识到他正处在自己不能完全理解的情景之中时就会出现自反认知现象”。所谓“置换”模式是指这种情况：“古老的妇女文学形象模式……在妇女小说中不断发生转换，或者出于喜剧的目的……揭示出她们隐秘的现实……或者是渐渐指向她们的对立面”。因此，“置换”模式听起来仿佛是吉尔伯特和古芭破坏性策略理论的最早翻版，因为她们认为，破坏性策略就蕴藏在妇女小说的表层之下。

在克劳蒂妮看来，“担忧被虚假的形象所迷惑，或担忧会陷入不真实角色的圈套”是“当今妇女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担忧”，接着她承认，这几乎不是妇女所特有的一个主题。但她却坚决主张，批评家的任务在于找出妇女在运用这种意象中所潜伏的经验差异性。克劳蒂妮认为，女权主义批评家应该经常探索小说背后的客观现实。“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女作家和她的女性人物对现实的理解，有时令人奇怪，有时显得怪诞，认为这是作家对现实的歪曲；但是我们务必记住，在下这种结论之前我们应该谨慎从事”。克劳蒂妮注重文本“背后”的经验，这种观点在下面的引文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这段话中，克劳蒂妮实际上论述了男女在运用同样的意象时可能存在的差异性：男人强烈的谋职意识和女人强烈的家庭意识最终都会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然而，文学的语言，如果它真实可靠的话，就会向我们显示出一组砌块，显示出一种每时每刻的人生经验，即人们仿佛被不同的环境套着了似的经验。

从总体上来看，克劳蒂妮的女权主义批评纲领仍然牢固地根置于“新批评”的土壤里：

女权主义批评应该是一种高度理性而又富有活力的批评，因此，它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必须严格克制自己，必须采取高度严谨的方法去分析文学风格和文学形象，决不应该把带有偏见或先入之见的结论附加给个别作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比较准确地评价文学作品的独特的主题和独特的成就；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教育我们的学生和同事（我相信，这些目标可以建构任何一种合法的文学批评而不去顾及其论题到底如何）。

除了使用听起来有点男子气的形容词比如“富有活力”和“严谨”等去描述正确的女权主义批评之外，克劳蒂妮还强调，不带先入之见的分析（似乎有这种可能性）是正确读解女作家的基础，其实这就大大违背了她的传统主义观点。反叛的女权主义者可能故意误读文学作品（就象凯特·米勒特所做的那样），即读解文学作品的“逆纹理”，并对既定的“合法的文学批评”结构提出质疑（女权主义者为什么要抵制非法性呢？），她们可以在女权主义批评家如克劳蒂妮，肖沃尔特和杰海伦所开辟的领域内找到小小的立足点。克劳蒂妮甚至还建议，女权主义批评应该“把政治思想意识与审美判断区分开来”，因为正如她所强调的，政治信仰会使我们的批评家变得“不诚实”。她声称，女权主义批评的目标应该是“通过对女作家作品进行合理地，公平地，不带任何性别偏见地研究，重新解放女作家，把她们的作品作为我们高等院校的课程”，克劳蒂妮以此主张而结束全文。尽管有少数人极力反对这种主张，但它却为学术界的女权主义争鸣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端庄优雅的框架。这种改良主义能否成为女权主义批评的必然结果，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熟虑的，因为这种女权主义批评在许多方面生吞活剥地接受了“新批评”的学说。

五年之后，克劳蒂妮又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越过布雷区跳舞：关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实践和政治的几点意见》，刊登在《女权主义研究》杂志上。在这篇文章里，克劳蒂妮重新讨论了她在1975年所提出的几个问题，她抱怨说，10年过去了，尽管一个完整而又崭新的智力咨询领域正在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但人们仍然不承认女权主义批评是“那次一直行进的智力旅行应当依靠的停泊地，在那次智力旅行中，我们只落个不太准确的学术名称‘批评分析’。人们既然不欢迎我们登上旅行的列车，那我们就只好被迫越过布雷区了”。克劳蒂妮认为，“如果我们明确阐述自己的方法论和理论构想，那么，学术界对女权主义批评的敌视态度或许会转化成一場真正的对话”，而这恰好是克劳蒂妮着手所要做的。克劳蒂妮争辩说，女权主义批评基本上采用“怀疑论”的方法去研究文学。她认为，女权主义批评家的主要任务就是检验我们审美判断的正确性：“这些审美判断的目的是什么？女权主义者问道，它们（即便是不自觉地也罢）促进什么样的世界观或思想态度永世长存呢？”。无疑这是克劳蒂妮最有价值的洞见之一。

当克劳蒂妮从这种观点出发，转而把多元论作为合适的女权主义观点予以热情推荐时问题就出现了。她认为，女权主义批评缺乏系统性。这种事实（多样性的事实）应该始终如一地把“我们安全放在我们本该所处的位置上：与其他多元者一起在远离布雷区的去野营”。女权主义者不可能而且实际上也不应该把那种“内在的连贯性规定为一个体系”，但克劳蒂妮却将它归于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在她的论文里，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被描述成一块完整而又沉重的巨石高悬在形形色色的反独裁的女权主义批评领域之上。然而，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却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而女权主义批评则是那种多元化的批评，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克劳蒂妮承认，女权主义政治是女权主义批评的基础，因此尽管我们或许会争论究竟是什么才构成正确的女权主义政治和女权主义理论，但这种争论仍然逃不出女权主义的政治框框，正如发生在当代马克思主义领域内部的那些争论一样。没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女权主义批评根本就不会得到公认。在这种情况下，克劳蒂妮的“多元论”观点要冒把澡水和婴儿一块泼掉的危险。

采取“多元论”的观点并非意味着我们抱折衷主义的态度不去争论，而仅仅是指我们抱有这样的可能性：在不同的研究条件下，不同的阐释，甚至对同一文本的不同阐释，可能会有不同的作用，甚至会有启发作用。

然而，如果多元论足以使我们承认，在众多“有用”的方法论中，女权主义批评只是其中的一种，那么我也会暗暗承认“男权主义”（masculinist）批评存在的合理性：在与我们的批评截然不同的情况下，男权主义批评也许是“有用的”。

克劳蒂妮在这场理论争论中所进行的调停几乎看不到政治在批评理论中的作用。一方面，她正确指出：“如果女权主义批评怀疑一切，那么它肯定会成为那种狗咬狗的理性中立的神话”；另一方面，她似乎仍然不承认批评理论甚至会带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她认为，女权主义批评不会单单引进一种近乎滑稽的多元论，顺应各种批评流派和批评方法，相反，女权主义批评没有成为任何一种批评的俘虏；它承认，对于我们的批评来说，各种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必然会被广泛地继承下来，成为我们批评中特有的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女权主义者还应该对各种方法和工具作出政治评价和理论评价以确保它们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回火”现象。

（中）

伊莱恩·肖沃尔特

伊莱恩·肖沃尔特被认为是美国最重要的女权主义批评家之一，因此，她的理论见解对于我们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下面我想考察一下她关于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两篇论文，《走向女权主义诗学》（1979年）和《荒野中的女权主义批评》（1981年）。

在第一篇论文里，肖沃尔特把女权主义批评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把妇女作为读者来考察，肖沃尔特称之为“女权主义批判”（feminist critique）；第二种类型是把妇女作为作家来考察，肖沃尔特称之为“女性批评”（gyn-ocritics）。“女权主义批判”探讨男作家的作品，肖沃尔特告诉我们，这种类型的批评“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去探索文学现象的意识形态臆说”。然而，这种批评运用“怀疑论”的方法去研究文学文本，似乎与肖沃尔特第二种类型的批评完全不同，因为在“女性批评”的基本活动中，我们不仅发现了“女性艺术创造的心理动力”和“个别作家作品的研究”，而且还发现了“妇女文学的历史、主题、体裁及结构”。这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女权主义批评家把妇女作为作家来考察就是应该抱着冷漠的态度，运用差异性的方法去研究妇女文学。怀疑主义的阐释学假定，文本不是，抑或不仅仅是它所伪装的那个样子，所以不仅应该在文本中寻找不在（absence）和沉默（silence），而且还应该去发掘潜在的矛盾和冲突，看来，这种阐释学是专门等候男人的文本来受用的。换言之，女权主义批评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女性文本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完全不同于男性文本。

肖沃尔特写道：

女权主义批判所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它以男人为中心。如果我们只去研究陈旧的妇女形象模式，研究男批评家的性歧视行为，研究妇女在文学史上所扮演的有限角色，那么，我们就很难了解妇女的真情实感，而只能了解到经过男人理想化了的妇女的“思想感情”。

肖沃尔特的言外之意不仅是指，女权主义批评家应该转向“女性批评”，研究女作家的作品，以便了解“妇女的真情实感”，同时还指出，人们可以从女作家的文本中直接获得这种真情实感。也就是说，文本已经消失，或者说文本变成了一种透明的玻璃；人们透过它可以看到女性的“经历”。众所周知，这种认为文本能够传播真正的“人类”经验的观点，正是西方传统的父权主义人道主义观点。在肖沃尔特看来，人道主义往往还带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她拒绝承认，理论是男人的专利品，只能用于男性文本。她认为，“女性批评”不再去迎合男人的标准，“而把聚光灯对准女性文化中崭新的直观世界”。肖沃尔特认为，要想最有效地探讨这种“默无声息”的女性文化就应该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去分析女作家及其作品。因为“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都是女性亚文化群的逻辑前提，所以可以说，女性批评与人类学息息相关”。换言之，女权主义批评家应当重视“女性”文本的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总之，除文本以外，一切文化现象都应当作为一种意味深长的研究程序而给以关注。肖沃尔特似乎承认，影响文本构成的唯一因素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超文学（extra-literary）因素。这种态度连同她对“男性”理论的畏惧以及她对“人类”经济的普遍要求产生了令人不幸的后果，险些将她拉入男性批评家集团，尽管她曾极力反对他们的父权主义价值观。

在《荒野中的女权主义批评》一文里，肖沃尔特倾向于重复同样的论点。这篇文章的新颖之处在于，肖沃尔特用很长的篇幅向我们描述了在她看来可以代表当今女权主义批评的四大趋势：生物学批评、语言学批评、精神分析学批评和文化学批评。虽然她对女权主义批评领域所作的特定区分或许会引起争议。但从总体上来看，肖沃尔特已逐步认识到了理论的重要性。她仍然使用“女权主义批判”（在这篇文章里又被称为“女权主义阅读”[feminist reading]）和“女性批评”的概念。肖沃尔特告诉我们说，女权主义批判或女权主义阅读“在本质上是一种阐释批评”，她还说，“很难对阐释活动进行统一的理论概括。因为作为一种批评实践，女权主义阅读在本质上是折衷主义的，而且范围广泛，尽管它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肖沃尔特试图避而不谈棘手的“男性”理论问题，诸如，阐释是什么？文本是什么？等等。肖沃尔特一度相当坚决地拒绝讨论“男人批评理论”问题，因为“男人批评理论使人们依附于它，阻碍我们解决自我理论问题的进展”肖沃尔特对“国人批评理论”和“自我理论问题”的划分没有给予详尽的阐述或论证。这使我们亲眼看到，她在谴责“白发先父”拉康、麦舍雷和恩格斯的同时却认为，埃德温·阿德勒和克利福德·格尔茨两人提出的文化理论尤其符合“女性批评”活动，于是给了高度的赞扬。尽管她曾为这种明显的自相矛盾的象征性作过辩解（“我并非想……推崇阿德勒和格尔茨作为新的白发先父而取代弗洛伊德，拉康和布鲁姆”），但她的这种态度难免会使一直信奉她的读者感到无所适从。这种鼓舞人心的“女性批评”究竟是否应该运用“男人”的批评理论呢？肖沃尔特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最后回答是一种直言不讳的闪烁其词，实际上是以“理论”和“知识”之间的一种模棱两可，犹豫不决的矛盾认识为基础的：“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富有建设意义，但终究代替不了博大精深的妇女文本知识。因为妇女文本知识是我们最根本的主旋律”。然而，在这以前，什么样的“知识”没有经过理论的过滤呢？

所以，现在我们应该重新回到原来的问题上去，即完全必要去建立一种合适的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因为过多的理论研究会妨碍我们获得肖沃尔特本人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所充分展现出来的“博大精深的妇女文本知识。”这就很好地说明了她对文本及文本问题的恐惧，因为如果对这个领域进行真正的研究，就会明显地暴露出女权主义批评这种经验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变种，与其恰恰反抗的男人的学术统治二者之间所存在的根本的“共谋”关系。

下面我将简明扼要地说明二者之间的共谋关系。人道主义者认为，文学是一种有效的教育工具：学生通过阅读“伟大的作品”可以成为一名高尚的人。伟大作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有时甚至是她）努力传达出生活的真理，而读者或评论家的任务就是洗耳恭听作家通过文本所传达出来的真理。“伟大文学”的文学原则确认，正是这种“典型经验”（由资产阶级男批评家所精选的一种经验）才得以传给下一代，而不是在大多数的妇女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和工人阶级文学中表现出来的那些离经叛道的非典型经验。尽管英美女权主义批评已经向这种过于自信的中产阶级男人价值原则展开过斗争，但却很少反对这种文学原则。实际上，肖沃尔特的目的是要创立一种独特的妇

女文学原则而不是摒弃所有的原则。然而，新原则往往比旧原则具有更严重的内在压抑性，所以，女权主义批评者的任务仍然是，静心地倾听女主人的故事，倾听女主人那真实的女性经验，女权主义读者不应该站起来对女主人的故事提出质疑；妇女文本与古老的男人文本一样实行着专制统治，仿佛作为一种服从补偿，女权主义批评家被获准可以对“男人”文学进行怀疑和批判；但必须有一前提，这就是应当把这种批评方法与妇女文学研究有效地区别开来。然而，如果把文本视为意味深长的过程，而将写作和阅读理解成文本的生产，那么很可能甚至就连女作家的文本也可能会遭到女权主义批评家傲慢无礼的审查。

(下)

迈娜·杰海伦

看来，迈娜·杰海伦的《阿基米德与女权主义批评的悖论》一文已经引起美国众多女权主义批评家的极大兴趣。该文发表于1981年夏，两次被收入选集中。杰海伦在这篇论文里固然讨论了有关重大问题，但实际上她却致力于讨论“鉴赏性阅读和政治性阅读”之间的矛盾关系。杰海伦不仅在女权主义批评领域碰到了这种基本问题，而且把它称作整个女权主义研究中的“激进的比较主义(radical comparativism)”。在她看来，由斯帕克斯、莫尔斯、肖沃尔特、吉尔伯特和古芭等人所写的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著作由于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妇女文学传统上而遭到损害。杰海伦说，竟然有人想建立“一个女子语境(contaxt)，亦即建立一个远离男人主观臆想的女子语言王国”，对此她感到痛惜。她希望妇女文学的研究应当拓宽视野“从妇女自身的观点出发去研究一切事物”，杰海伦的这张蓝图不仅显得雄心勃勃，而且也显得力度不凡。事实上，女权主义批评是以考察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埃尔曼，米勒特)而开其端的，因此，今天的妇女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女权主义作品的这一方面。不止于此，杰海伦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她建立运用比较的方法以确定“妇女文学和男人文学之间的差异性，如果只研究妇女文学就很难描述出这种差异性”。她认为，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一书“就是运用比较的方法写成的”，然而，她的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米勒特的《性政治》主要是讨论男人文学的。

杰海伦的观点中有一处危险的滑坡，因为她先是过分强调有关的性特征，进而又提出建议说，女权主义应该重新研究父权主义传统的文学原则。这种模棱两可的论点正好说明了她深信她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即“从一个立足点出发可以看到我们全部的概念宇宙，但这个立足点却牢固地站在男人的大地之上；而这个立足点正是女权主义者真正需要的东西”。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模棱两可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阿基米德的形象及其支点周围有许多严重混乱的花言巧语。杰海伦争辩说，女权主义思想是一种“激进的怀疑主义思想”，这就给它的实践者带来了不同寻常的困难，杰海伦写道：

阿基米德一方面要用杠杆移地球，另一方面他必须在地面的某个地方确定自己身体及其支点的位置。女权主义者就有点类似于阿基米德。她们怀疑自然和历史的假定秩序——于是提出把地球从她们的脚下移开——看来这得需要一个选择的基础。

在这里，杰海伦暗示道，女权主义已陷入悖论的处境：在父权主义领域之外如果没有妇女说话的立足点，那么对于女权主义者的存在和反父权主义的演说，我们又如何从根本上加以解释呢？杰海伦对支点形象的强调（“阿基米德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一个地面支点”）有一种不幸的后果，它暗示了这种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一个地面支点永远也不会移动地球的）。杰海伦告诫人们不要企图移动地球，相反倒应该让女权主义的双脚移到“男人的大地上”——换句话说，这正是女权主义，无论是坚持妇女中心观的女权主义还是坚持其他观点的女权主义——始终坚持的观点。如果仍然没有一块未被父权主义沾染过的空间供妇女说话，随之而来的结果必然是，我们根本就用不着选择支点，因为我们简直别无选择，无路可走。

肖沃尔特在评杰海伦的文章中反对她关于“激进的比较主义”转向的建议，因为在肖沃尔特看来，“这种转向可能意味着要丢掉女权主义的冒险精神，而我们至今仍然为这种冒险精神所震慑”。肖沃尔特为妇女文学传统的研究而辩护，认为这种研究是“一种方法论的选择而绝非是一种信仰。”肖沃尔特声称：

我们知道，任何一位妇女从来都没有真正与男人的世界割断联系，但是在理想的世界中，我们不妨画出几条开辟思想新视野的分界线来，使我们可以从一个新角度去观察问题。

虽然没有必要在男人的世界中去创建“一个女人的王国”，但是毫无疑问，对妇女文学传统的研究却超越了方法论的选择：这是十分紧迫的一种政治必要性。如果父权主义把妇女当作女人来压迫，不顾其中的个性差异就认为我们一律带有“女子气”，那么女权主义者就应该努力识破父权主义关于“女子气”是女人天生的生物属性的诡计，同时还应该把女人真正看作女人，努力为女人的权益而辩护。在父权主义社会里，女作家因为是女人而遭到歧视，所以往往很容易被当作一个单独的群体而给予合法的讨论。当前，较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避免父权主义的美学概念、历史概念和传统概念影响我们决定建构的“女性传统”。在《她们自己的文学》里，肖沃尔特本人并没有抵抗住父权主义的诱惑，而杰海伦对这个问题似乎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位自称是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家却大量接受了父权主义的传统美学范畴，这简直让人惊诧万分。

杰海伦还讨论了与“政治性阅读”相对的“批评性鉴赏”问题，她声称：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之所以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性，是文学的特有本质所使然。文学研究的对象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有别于社会科学；与这些学科不同，文学本身就是一种阐释，批评家的任务就是对它进行破译。文学作品带有偏见性，这的确已成为老僧常谈，但偏见性正是文学作品的价值之所在。批评的客观性只能进入第二个层次，为我们提供一种可靠的阅读，尽管许多人争辩说，阅读也是创造性阐释的一种操练。杰海伦认为，文学文本是破译的对象。然而，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一旦取消了作者，破译文本的主张就会变得徒劳无益”。在杰海伦看来，文本是作者心声的密码信息，而“批评的客观性”可能在于以较易理解的一种形式去如实复制这种密码信息。作者和文本的地位一开始就未能在杰海伦的文里得到清晰地描述。她一方面正确指出，女权主义作为“他者的哲学”已经摒弃了浪漫主义的信仰，即“做一名伟大的诗人，就是昭示绝对真理，就是要充当全人类的预言家”；但同时她却接着指出，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公平而又准确地对待作家，以再现文学主体的“独特风采”。用她的话来说就是：

所以，我们应当首先承认文学主体具有独特的整体性，尔后再开始我们的研究。文学的独特风采并不需要我们的风采——形式主义者告诉我们文学具有整体性。我们还应当承认，尊重文学的整体性，不要去问文本自身所没有的问题，要问文本自身所具有的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对文本获得完满的理解。

这种观点的必然结论是：杰海伦应当斥责凯特·米勒特，因为米勒特在探讨亨利·米勒的作品时“故意远离主题，粗暴地对待他的作品”，“损害了作品的整体结构”。杰海伦认为，米勒特的批评不仅是不适当的，而且也是粗暴的。她的这种批评玷污了亨利·米勒作品纯洁的完整性。就正在探讨的作品而言，任何人似乎只要用足够的努力就能发现一系列的客观事实；而这些客观事实无论如何必然会左右着批评家——一切批评家的探索。杰海伦强调指出，女权主义者必须遵从合适的阅读原则，否则就会变成“错误的”或“不诚实”的批评家。这一主张无疑是安耐特·克劳蒂妮观点的重复。休·沃里克·多伊德莱恩正确的辩论说：

毫无疑问，语言学 and 人类学的新见解已经揭穿了任何关于艺术作品具有自主性看法的荒谬性。什么我们不要亵渎艺术品的圣洁性，什么我们只有进入（以我们卑贱的客观性的方式）艺术品的殿堂才能“提供一种可靠的阅读”，统统是假话。女权主义批评家可以（小心谨慎地）拿来某些流行的父权主义的基本原则，因为这些原则能够使我们不再为“误读”或“误释”文本而抱歉。

帕特希妮娜·施苇卡特也曾就这一问题与杰海伦展开过辩论，她论证了杰海伦的理论与“新批评”学说之间的背后联系。她说：

值得注意的是，杰海伦的观点是以形式主义为基础的——她的关于艺术具有自身目的性的见解以及为了把文学作为文学来阅读（毋宁说是作为一种社会文献来阅读），必须受到文本的内在限制（亦即为文本所认可）的相关主张都是建立在形式主义基础之上的。这些观点已经引起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某些读者反应理论的激烈争议。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应当盲目地去赶批评的时髦。我只是想借此说明，新批评的基本原则至少已经受到了人们的怀疑，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它视为公理而机械照搬。

然而，如果说杰海伦对“批评性鉴赏”和“政治性阅读”所作的区别是建立在传统定义的基础之上的话，那么从女权主义观点来看，她希望首先强调政治问题这种绝对的划分，认为这可以提出较为复杂的政治问题。因为女权主义批评和非女权主义批评之间的差异性并不在于，正如杰海伦所认为的，前者是政治批评，而后者则非然；它们的差异性在于，女权主义批评公开宣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非女权主义批评要么意识不到自身的价值体系，要么试图把自己规定为一般化的“非政治批评”。杰海伦认为，创作，就象她在美国女权主义批评15年之后所做的那样，显然应该毫无疑问地摈弃女权主义批评最为基本的政治观点，这种做法尤其显得异乎寻常。

杰海伦坚决主张应当把政治和艺术分离开来，以便解决激进的批评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即如何评价一部具有较高艺术价值但却具有令人厌恶政治内容的艺术作品。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她放弃任何公认的女权主义观点去结束争论，那是因为她不仅拒绝承认艺术价值的判断与历史有关，而且拒绝承认，艺术价值判断深深地浸润着政治价值判断。人们常常说，某某诗歌结构达到了有机的统一，它的各个部分相互作用，协调一致，并以此作为艺术的典范向人们推荐；但即使这样的艺术，也并非没有一点政治痕迹。女权主义者或许会感到困惑，为什么人们总想把“秩序”和“总体”这样的概念放在十分突出位置上而大加强调呢？这是否与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倡导者所拥有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有关呢？诚然，认为一切艺术范畴都带有自主的政治含义，那是一种绝对的简单化倾向；但是，象杰海伦那样，认为艺术结构在政治上始终不变地是中立的或“非政治的”，却更是简单化倾向。当然，问题在于，同样的艺术方法可能是政治上的多价染色体（polyvalent），它随着它产生的历史、政治和文学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杰海伦认为，“意识形态批评”（在她看来，这种批评与“政治批评”或“偏见批评”完全相同）是一种简单化批评。如果所有的阅读活动在某种程度上都还带有政治性，那我们就很难坚持“新批评”的二元对立主张，即一方面是简单化的政治阅读，另一方面则是丰富性的审美欣赏。如果艺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文本是否（和如何）对读者有效地发生作用，那么，艺术显然就与政治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没有艺术效应也就不会有政治效应。当然，如果女权主义政治中蕴含着“经验”，那么，它也就与艺术休戚相关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这本书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女权主义批评是关于解构政治和艺术对立的批评：作为一种政治批评，女权主义不仅应该意识到政治观点中蕴含着艺术性，而且还应该意识到艺术范畴中同样包括着政治性。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我认为，杰海伦的观点削弱了女权主义批评的某些最为基本的原则。如果女权主义把反抗作为“价值自由”实习的文化批评中的父权主义思想，那么它就会处在政治上名誉扫地的紧急危险之中。

阅读： 次
录入： Stacey

[【 评论 】](#) [【 推荐 】](#) [【 打印 】](#)

上一篇：[男性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当代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述评](#)
下一篇：[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潮](#)

相关新闻

本文评论 [全部评论](#)

发表评论



点评： 字数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责任
-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姓名:

发表

Copyright©2006 Centre for English Studies, Zhengzhou University

版权所有: 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

Centre for English Studie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PR China

中国 河南 郑州 科学大道100号 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 450001

[Contact us](#) [联系管理员](#) **iwms 4.4**